

乾嘉儒学

的义理建构与思想论争

孙邦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乾嘉儒学

的义理建构与思想论争

孙邦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乾嘉儒学的义理建构与思想论争 / 孙邦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 - 7 - 5203 - 2372 - 7

I. ①乾… II. ①孙… III. ①儒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616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郑成花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2
字 数 443 千字
定 价 1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中期儒学的转型与流变”(12CZX031)结题成果

承蒙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浙江省一流学科和“新时代温州道德文化建设创新研究”重点创新团队经费资助出版

序

近四十年来，相对于宋明儒学（理学与心学）较为充分的研究而言，乾嘉儒学的研究则显得有些沉寂，其学术成果也相对贫乏。据笔者本人有限的阅读而言，对于乾嘉儒学研究的不足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对乾嘉儒学的整体精神面貌认识不够清晰，因而对其整体精神风貌也就难以达成基本的学术共识；其二，有关乾嘉儒学学术渊源的讨论，往往是人言言殊，各有道理，但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其三，乾嘉儒学内在思想的逻辑进程及其历史转折点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其四，乾嘉儒学诸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乾嘉时期理学（包括心学与气学）的实际成就如何？学术界没有给出较为合理的说明。仅就此四点而言，乾嘉儒学及其自我转化的问题，就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并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课题。

邦金君的新著《乾嘉儒学的义理建构与思想论争》，就是一本试图超越目前此领域的不足而在诸多方面有所创获的新著。该著分上中下三编，共十七章，加上绪论与结语，有近二十章的篇幅，虽然是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结项成果，未能对此一时期的儒学内容做一个十分全面的论述，却也基本上体现了作者对于乾嘉儒学研究的框架性思考，展示了作者在此领域的宏大构思以及所蕴含的巨大学术发展潜力。就笔者个人的粗浅认知来看，该书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肯定：

第一，三编的思想结构呈现为哲学、学术与思想的三维互动，以此来立体地呈现乾嘉儒学的精神面向。第一编侧重于哲学思想，以乾嘉的新道论为代表，揭示了该时期儒学的哲学形上学。第二编侧重于学术讨论，以扬州学派、汉宋之争、经史之争、儒释之争、中西之争五组学术问题为中心，揭示了乾嘉儒学独特的时代风貌及其所面临的新问题。第三编侧重于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属于泛化的哲学史，因而可以归类到思想史的范

畴。三编的内容虽非面面俱到，但通过对一些典型思想家、学者、学派思想的深入阐述，大体上呈现了乾嘉儒学的丰富内涵，从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多维角度初步证成了作者提出的“乾嘉新儒学”或“新清学”的说法。

第二，作者用“乾嘉儒学”的概念来统领乾嘉时代的哲学、学术与思想，以之对接宋明儒学，进而与这一时代的佛学、道家与（西方）学术三组概念区别开来。这一概念对于研究乾嘉时代中国本土的主流学术与思想对象而言，有其方便与合理之处。儒学是体有用之学，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哲学学科，可以在儒学的形上学与制度之学中找到其相关的内容。汉唐以来的儒学也是官方的学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政策大多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其主流部分是儒学的，佛、道及其他思想基本上是一补充性的内容。而中国传统学问的分类及其次第——经史子集，也主要是儒家的，各种学术流派与学术问题，都会与儒学发生直接的关系。因此，作者使用“乾嘉儒学”的概念来代替乾嘉考据学、乾嘉哲学、乾嘉学术等概念，更能够比较真实地体现这一时期主流的学术与思想状况。

第三，一些具体的论题与论述很有新意，拓展了对乾嘉时代学术与思想的研究广度，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深化了对乾嘉学术的认识。现仅择其要，略述如下：

在论题方面，对乾嘉时代学人的心性之学、政治儒学、士大夫的治生问题以及这一时期儒学的护生观念和生态保护思想四个方面，有所拓新。而在这四个论题中，笔者认为，该著对乾嘉时代的心性之学的抉发尤其富有新意。该论题一方面可以对接宋明儒学，另一方面亦可以回应现代新儒家对于乾嘉儒学的批评。

在具体论述方面亦颇多新意，难以尽加罗列。例如，第四章将戴震“以情絜情”的伦理学思想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普遍正义思想联系起来，初步揭示了戴震伦理学的政治哲学意蕴与现代意义。第九章进一步揭示出焦循“能知故善”的伦理学思想与戴震“德性资于学问以至于神明”，“愚者非恶而流于恶”这种重智主义伦理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既显示了扬州学派与皖派的内在思想联系，也揭示了乾嘉儒学的伦理学的自身特点。第七章在揭示“乾嘉新道论”的三个理论节点问题时，指出明清易

学的太极非理说构成了道论形上学的一个重要节点。此点笔者在论述乾嘉新道论时未能予以关注，而且邦金君从学理上分析了新道论的三个维度，思路清晰而结论可信，因此笔者认为其对新道论的阐发有补充、完善之功。第三编第十四、十五两章，有关乾嘉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的论述，均有新意，对于重新认识乾嘉学者在十分艰难的历史处理境里仍然坚持儒家政治理想的抗议精神，爬梳出了新的思想史资料，值得肯定。

简而言之，作为清代学术研究的后劲，邦金君此著的出版将会深化、细化此一领域的诸问题研究，相信其后续修订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龚自珍政治思想研究》会在政治哲学思想方面进一步深化乾嘉与嘉道时期儒学思想的研究。

邦金君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经师从于我，在我完成“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的过程中，他与我合作撰写了不少文字。因此，在近十几年的清学研究，特别是乾嘉学术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是同道者。作为此领域里因年齿而具师长身份的同道，对于该书中存在的学术与理论空间，也尝试言说一二，一者供邦金君参考，二者也是与对乾嘉学术有兴趣的其他同道者相互切磋，以期共同推进包括乾嘉儒学在内的乾嘉学术研究。

就乾嘉学术的哲学形上学思考而言，此一时期重要的儒家学者与思想家大体上提出了自己的道论思想。但他们对于道的具体内容的规定是不同的，而且其道论的思想来源亦不相同，此点不可不辩。若将戴震与章学诚看作乾嘉时代的两面思想旗帜，则戴氏的道论基本上代表了气化论的道论思想谱系；而章氏的道论思想似乎更为复杂，既有宋儒程朱一系形上之“理”的影子，又有韩愈的道德论的思想影子，但主要是《易传》的道论思想，特别是在道器关系方面，似乎更受《易传》的影响。目前作者虽然阐述了乾嘉时期的新道论思想，但对于有些思想家如钱大昕的天道论思想未能触及，对于章学诚道论思想的丰富内容及其独特性的阐发亦略显不够。对于焦循从易哲学立场出发论天道的思想的特征，阐述得也不够充分。

我们都知道，儒学是有体有用、明体达用之学。从儒学这一基本的思想特征出发，全书的整体架构应当先是道论形上学，然后是度数之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最后才是学派与其他学术问题之争。具体来说，即将目前的

第二编作为第三编，第三编作为第二编，或许更能体现“乾嘉儒学”概念的内在思想逻辑。

另外，全书体现了作者对于近百年来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诸家思想成果兼收并蓄的特色，这是本书长处。但也正因为作者力图兼顾各家各派的观点，淡化了自己的立场，对于乾嘉儒学的主流发展脉络及其逻辑进程，反而没有很好地凸显出来。特别是对一些具有思想锋芒的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如戴震、钱大昕、龚自珍等的批判精神，没有充分地凸显出来。在行文方面，全书洋溢着作者博览群书的才气，但从人文著作的科学性方面说，有些引文似乎可以减少，而有些证成性的结论似乎需要更多的直接材料与相关的间接材料作支撑。

凡以上提到的种种不足，仅是对本书的精益求精而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对学术后劲的一种勉励与鞭策之辞，并不影响对本书学术质量的充分肯定。

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在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诸先生的引领下，在明清哲学、《周易》哲学、现代新儒家诸领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成绩。邦金君虽然现在供职于温州大学，但他在明清哲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仍然可以视之为珞珈山中国哲学的新成果之一。希望邦金君继续努力，立足于珞珈山中国哲学的学术之根，然后广泛地吸纳其他各家各派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成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地深化、细化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若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开创出新的研究范式，则将是对珞珈中国哲学最好的回馈。

是所望也，亦期于成。

吴根友

2018年2月9日于武昌，2月22日润色。

目 录

序	(1)
---------	-----

绪论 乾嘉儒学的思想意蕴与研究现状	(1)
一 清代儒学的两次转型及其阶段性特点	(2)
二 乾嘉儒学的思想意蕴与新近研究进展	(12)
三 对乾嘉儒家哲学思想的诸种诠释及其不足之处	(21)
四 研究方法 with 整体思路	(36)

第一编 乾嘉儒学的经典诠释及其义理建构

第一章 惠栋的学术思想与乾嘉考据学范式的莫立	(43)
一 尊经好古：“若经学则断推两汉”	(45)
二 识字审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	(47)
三 别立新疏体例：唐疏《易》《书》皆不足传	(50)
四 理欲相兼：“理字之义，兼两之谓”	(53)

第二章 戴震哲学思想的理论架构及其形上学基础

——兼对现代新儒家对戴震哲学批评的一个回应	(60)
一 现代新儒家对于戴震哲学的严厉批评	(61)
二 清代形上思维的衰降与戴震的反应	(66)
三 道赅理气的天道一本论	(72)
四 “仁义之心，原于天地之德者也”的自然合目的论	(80)

第三章 戴震的人性论及其对孟子性善论的诠释	(86)
一 “人能明于必然”的人性论	(86)
二 “果实之白,全其生之性”的性、命、才关系论	(90)
三 “心之所喻则仁也”的心性关系论	(95)
四 “知而无蔽”与“容光必照”的智识主义	(97)
五 “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至善追求	(102)
第四章 戴震的絜情理论及其普遍正义原则	(104)
一 “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的一本论	(104)
二 “情”之两层含义:“情欲之情”与“絜情之情”	(108)
三 “使人自求其情”的反身性原则	(111)
四 “以我之情絜人之情”的公平原则	(113)
五 “推诸天下万世而为准”的普遍正义原则	(115)
六 从“共遂其生”到“得理合义”的义务论特质	(118)
第五章 王鸣盛的经学考证与史学理论	(121)
一 经学考证中的崇郑立场与泥古倾向	(122)
二 “议论褒贬皆虚文”之实证史观之辨析	(126)
三 “以不议为议”的史学化境之追求	(136)
四 经史研究与历史语言学方法	(139)
第六章 赵翼的历史哲学与史学解放	(145)
一 赵翼与乾嘉考证史学	(146)
二 “不著一议而人品自见”的历史书法	(147)
三 “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	(150)
四 “所欲咸得遂”的伦理学思想与史学解放	(155)
第七章 乾嘉儒学的“新道论”形上学	(162)
一 清代中前期易学对于“理为太极说”的解构性批评	(163)
二 乾嘉学者道、理二分的“道一理殊”论	(166)
三 乾嘉新道论哲学的思想史意义	(170)

第二编 乾嘉儒学的思想论争及其分化流变

第八章 扬州学派与戴震语言典章度数之学的发展	(177)
一 戴震后学与扬州学派	(178)
二 扬州学者对戴震“因声求义”小学思想的深化	(182)
三 扬州学派的名物典章制度之学	(185)
四 扬州学派的数学与科技史研究	(187)
第九章 扬州学派与戴震哲学思想的发展	(191)
一 汪中的荀子学与人道主义思想	(191)
二 凌廷堪的“以礼代理”说	(193)
三 阮元的“相人偶”说与“节性”论	(193)
四 焦循的“能知故善”论	(196)
五 对扬州义理之学的几点反思	(199)
第十章 汉宋之争与乾嘉儒学的自我总结	
——以江藩与方东树之争为例	(202)
一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	(202)
二 义理、考据与辞章之间的竞争	(213)
三 “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与“义理明而后训诂明”	(223)
四 “汉学”与“宋学”之间的“新清学”	(230)
第十一章 儒释之争与乾嘉心性之学的多元开放意识	
——以龚自珍为中心	(236)
一 生命、思想与文字上的人性论	(238)
二 乾嘉心性论的多元取向	(240)
三 佛学与心学的复兴与会通	(243)
四 龚自珍心性之学的异端取向	(247)
五 龚自珍心性之学与佛教心性论的会通	(254)

第十二章 经史之争与乾嘉儒学的知识分立运动

- 以章学诚与龚自珍的六经皆史论为中心 (260)
- 一 乾嘉经史之争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 (261)
- 二 章学诚综贯“尊德性”与“道问学”两大知识门类的
学术史贡献 (267)
- 三 “毅然破乾嘉之门面”:从章学诚到龚自珍 (271)
- 四 “其运实为道问学”:龚自珍论乾嘉
学术知识的独立与分化 (274)
- 五 经、子皆史与龚自珍重整经学体系之努力 (279)
- 六 经学“分裂而入数科”:经史之争的最终结局 (283)

第十三章 中西之争与乾嘉儒学的近代命运

- 以傅斯年与乾嘉学术为中心 (287)
- 一 “始于疑而终于信”——疑古与信古的平衡 (288)
- 二 “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乾嘉史学及其方法的科学化 (293)
- 三 “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本土渊源 (299)
- 四 “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乾嘉考证学与历史语言学派 (305)

第三编 乾嘉儒学的学术生态与社会政治观念

- 第十四章 清儒“道治合一”论的政治含义及其内在困境 (311)
- 一 清代“君师合一”论的形成 (313)
- 二 清代“道治合一”论的政治含义 (318)
- 三 儒家“治道合一”政治理想的内在困境 (325)

第十五章 清代儒学对君臣关系与忠君伦理的多元省思 (330)

- 一 “天子皆人”与“天子一位”论中的政治祛魅意识 (331)
- 二 “君臣义合”与“君臣人合”论中的政治自由意识 (334)
- 三 “君臣师友论”中的公共意识 (339)
- 四 “杀一不辜号为忠臣,君子为之乎?”——为忠君伦理设限 (343)
- 五 结语 (346)

第十六章 乾嘉士大夫阶层的治生问题与学术生态

- 以章学诚和龚自珍等人为中心 (348)
- 一 忧道亦忧贫：“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348)
- 二 道德理想主义的颠覆：“为彭泽解嘲” (351)
- 三 自树其职与安贫乐道：“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 (356)
- 四 学与术并重：“君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而难于
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 (360)
- 五 出处之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363)
- 六 “吾悲蚊虻无肝肠”的道德拷问 (367)

第十七章 明清儒学的护生观念与动物保护实践 (374)

- 一 明清劝善运动与通俗善书中的护生观念 (375)
- 二 明清护生运动中的果报观 (379)
- 三 明清儒学的护生观念及其对果报观的反思 (381)
- 四 明清时期西方动物保护观念的传入与论争 (386)
- 五 几点结论 (388)

结 语 乾嘉儒学的义理建构与思想论争 (391)

- 一 打破“道统”，重建“道论” (393)
- 二 乾嘉儒学的多维理性与启蒙精神 (395)
- 三 乾嘉儒学的思想论争与自我裂变 (405)
- 四 乾嘉儒学的理论缺陷及其现代意义 (406)

参考文献 (408)

- 一 古籍类 (408)
- 二 近人著作 (414)
- 三 研究论文 (424)

后 记 (428)

绪 论

乾嘉儒学的思想意蕴与研究现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起伏跌宕的近代境遇及其当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历来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极重要课题。从时间上来看，儒学传统的近代转化问题当然是在 1840 年西方文化冲击之后才产生的一个课题。不过追根溯源，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儒学传统的近代转化问题并不全部都是截断众流的新问题，有很多是由来已久的，只是夹杂着西方因素变得更加复杂而已。虽然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中国近代化尚未真正开始，“但 18 世纪的现实却是尔后近代化的起点，基本上可以解释中国近代化的模式、速度和阻力。”^① 二是没有前近代的儒学传统，也就无从谈起儒学传统的近代转化问题，而且西方文化也会失去其引进与生存的土壤。这两点告诉我们，研究儒学传统的近代转化问题，不仅要关注近代以来的问题，还要照顾到近代以前的问题。

历史通常是一个以激进为间奏而以渐进为主旋律的过程，很多问题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都有着似曾相识的过去，都能够从旧问题中找到线索。理解中国近现代的哲学思想变迁亦不例外。诸如近代哲学上的道器、情理、心物、知行关系等，文化上的古今、中西、新旧之争，经济上的公私之争、治平之虑等，政治上的常变之争、改良与革命之争、中央集权专制与地方封建自治之争等诸多重大问题，在前近代的中国大都长期存在着，并有过许多探索和尝试的成败经验。我们起码要搞清楚儒学传统在迈入近代门槛之前它正处于何种样态？自身内部所发生的变化有什么样的轨迹和趋向？对于后来的变化又有何影响？本书即聚焦于中国迈入近代门槛

^① 戴逸：《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 页。

之前的清代中期儒学发展史,尤其是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两朝的儒家哲学与学术思想史。希望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乾嘉儒学为中心,一是揭示清代儒学转型与流变过程中的诸多有益尝试,使清代哲学思想史研究有所深化和改观;二是彰显清代中期学术思想中不断成长的现代性因素及其发展困境,为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 清代儒学的两次转型及其阶段性特点

清代儒学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可分为前、中、晚三个前后风格迥异的时期。一般来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①,王国维对清代学术历史分期及其阶段性特点的概括十分到位。当然,如若细论,自今观之,又非一言可道尽其中曲折也。

清初儒学,自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约八十年时间。改朝换代的明清之际,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动荡离乱的时期,也是一个人才辈出、光怪陆离的思想文化高涨的年代。这一时期的士大夫痛定思痛,开始集体性地总结反思传统文化,并在摸索中推陈出新,完成了其守先待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据粗略统计,明清之际诸如《理学宗传》《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儒林宗派》《道统》《学统》等学术思想史专著至少有25种之多。^②由此可见,明清之际的儒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总结过去、开辟新路——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转型期。

如若细分,清初八十年的士大夫又可分为“遗民”与“鸿儒”这两代学人。清初儒者面对“天崩地解”“残山剩水”,“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③,拒绝出仕、归隐书斋,堪称为遗民一代学人。他们在“陆沉之初,人怀感愤”,不仅拒绝清廷征召,坚守气节,而且为应对世乱,在学术思想领域亦多所创造,气象蔚为恢宏、博大。诸如河北

①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载《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

② 参见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2页。

③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载《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

孙奇逢、浙西顾炎武、浙东黄宗羲、湖南王夫之、关中李颀等人，大多生于万历、天启年间，着明朝衣冠，奉明朝正统。在此之后，康熙在位期间崇儒重道，于康熙十二年（1673）举荐山林隐逸，康熙十七年（1678）年征召博学鸿儒，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不断网罗人才，康熙本人的文化远见以及清廷的文化怀柔政策渐收成效。尤其是博学鸿儒科，共有朱彝尊、施闰章、汪婉、潘耒、汤斌、张烈、毛奇龄、李因笃等50位名儒入选，皆优入翰林，入列史馆，主讲经筵，明清之际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明显缓和。与此同时，他们与同时代的阎若璩、胡渭、万斯同、徐乾学、姚际恒等人会集京师，相互切磋，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对于清初学术走向之影响不可小觑。与遗民一代相比，时过境迁，他们的政治立场没有以前那么鲜明决绝，“其气渐平，心亦渐改”^①，开始从政治不合作转向合作；他们的学术思想亦开始了由通经致用之学向经史考据之学的整体性转变，直接开启了乾嘉学术，可称为鸿儒一代学人。^②

从思想流派上论，由于阳明心学存在“情识而肆，虚玄而荡”的流弊，加之明清鼎革的文化危机意识和忏悔心理，“兴复古学”^③（张溥语，“复社”之名由此而来）蔚为潮流。心学开始自我修正，并且进而由陆王心学回归程朱理学者越来越多，王学修正派和由王返朱派可谓清初儒学内部的两大流派。王学修正派包括孙奇逢、汤斌、李颀、黄宗羲等人，大致皆认可“阳明先生致良知为圣学真脉”^④，算是清代第一代王学学者，也是唯一一代能够成军的王学学者。虽然阳明后学对于儒学的自由意识、平民气质和“中国近世的庶民意识”^⑤的张大功不可没，但在陈建（1497—1567）《学蔀通辨》和张烈（1622—1685）《王学质疑》等反思王学专著 的推波助澜之下，“谨守考亭”“力尊考亭”^⑥等由王返朱的呼声一浪高

① 张履祥：《与唐灏儒》，载《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7页。

② 参见赖玉芹《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③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 汤斌：《志学会约》，载范志亨、范哲辑校《汤斌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⑤ 参见〔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28页。

⑥ 陆陇其：《答嘉善李子乔书》，载《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过一浪。仅顺治、康熙两朝就先后涌现出魏裔介、魏象枢、陆世仪、张履祥、吕留良、戴名世、陆陇其、熊赐履、张伯行、李光地等众多理学学者和名臣，煊赫一时。其中，陆陇其认为“明之天下之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学术”^①，矛头直指阳明后学。熊赐履则指阳明“率易立说，是不知而作也，是欺己欺人也”，“阳明之于圣学，只是胡说乱道而已”^②，可见清初阳明学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非后世所能及也”^③，理学在清初逐渐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除了上述两派之外，清代儒学又逸出了传统心本论和理本论的既有典范和轨道，由大易传统和张载气学而来的气本论得到了复苏和彰显。黄宗羲、陈确、方以智、王夫之、颜元等皆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明清气论的发展，其中尤以王夫之的气论最具代表性。心学和理学在清代中期皆备受诟病，然而气学似乎得到了清儒的特别关注和青睐，最终在理气一元论的基础之上，“道赅理气”的“新道论”成为清代中期儒学的形上学基础。这一转承，从戴震的天道观与黄宗羲、王夫之、陈确（尤其是王夫之）等的气学之间强烈的亲缘性中可见一斑^④。

清代中期儒学自雍正元年（1723）至道光十九年（1839）近一百二十年时间，为清学的“鼎盛期”。由于其典型风格主要在乾隆、嘉庆两朝成型，因此学界对清代中期学术的通行称呼是乾嘉学术。它较之于清初儒学思想的变化，有从明末清初偏重形上道德的虚玄体证与空描而转出的明显迹象，渐而转入形下征实考据、重情欲的新理路，拥有了自成一格的清学新典范。所谓新典范，是说清代中期儒学无论是在讲求实事求是的实证方法层面上，还是强调达情遂欲的实质内涵层面上，皆已超出了理学和心学的原有轨范，甚至也超过了所谓的“宋学”和“汉学”的范畴，因此可以说清代中期学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形态，不妨可称之为

① 陆陇其：《学术辨》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② 熊赐履：《下学堂劄记》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台南：庄严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78—80页。

③ 昭桂：《嘯亭杂录》卷一“崇理学”条，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3页。有关清初理学研究，可参见杨善《清初理学思想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8年版。

④ 有充分的文本与思想勾连表明，船山学“较近于戴震之学”。参见蔡家和《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13年版，第44页。